

中文版後記

本書日文版原著出版於2016年（臨川書店），中文版是為適合中國讀者閱讀改寫而成。原著為一般性讀物，應出版社要求幾乎未加註釋。但中國讀者自然比日本讀者掌握更多有關毛澤東的背景知識，故本書加以適當改寫和增補，份量亦較原著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並追加必要註釋，以便專家學者也可參考。就此點而言，較之日文版，中文版才是其應有的完整形態。

毛澤東研究是高難度領域，中國國內學者或因存在各種制約而感到困難，殊不知日本等外國學者也須面對多重障礙。首先，毛澤東逝世前形成的相關敘述極多，而其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又加大了研究和論述的難度。毛澤東在中國現代史上如何重要不必贅言，但在當下的日本，實際閱讀毛的著作以探究其所處所思的世界，又感到不合時宜——這是從事中國研究的日本學者的真實心境。

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數量眾多，則是外國學者研究毛澤東必須面對的另一困難。這些研究是很長時期內在特定歷史觀框架內形成的，自然有其局限；但無論如何，它們出自中國學者之手，佔有絕對優勢，且積累深厚。往往，外國學者以為發現了新資料、

新事實而興奮地發表論文，中共歷史部門的專家卻早有了解，對論文頂多會讚一句「作為外國人，寫得還行」。打比方說，外國學者研究毛澤東就好像乒乓球選手挑戰中國國家隊，拼盡全力也佔不到便宜，使出奇招也被對方一一化解，大比分落敗後還不得不握住對方伸過來的手，聽對方讚賞自己「打得不錯」。

此外還有黨史研究、領導人人物研究資料方面的限制。尤其是毛澤東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後形成的有關檔案，包括判斷是否備放在內，都被置於嚴格管理之下，外國學者無法接觸。不過，如部分學者那樣緊盯中國國內的禁忌和問題而有針對性地設定研究課題，並聲稱自己的研究屬於獨創、中國學者無法企及——那樣的研究著者卻又不屑為之。當下毛澤東研究人氣不旺，就是這種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但是，繞開毛澤東，還能理解現代中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毛澤東研究是絕對需要的。既如此，外國學者的研究須向中國學者看齊，盡量充實內容，提高水準。再次借用上述比方來說，就要摸索中國隊未曾見過的發球、削球技術，還須運用嶄新的戰術戰法。經過如此思考，成為著名革命家之前的毛澤東在同時代人們心中的形象如何，就進入了著者探索的視野。針對成為著名人物後的毛澤東收集資料再多，也很難有新發現；但將目光轉向此前的毛澤東，情況或許有所不同。

比如本書開篇提到的「胖子毛澤東」照片，著者初次看到時笑了出來。太滑稽了！但後來再次端詳這張照片時忽然想到，「我為什麼覺得這張照片滑稽、可笑呢？」再進一步想，那時的人們如何看待毛澤東？都說他因斯諾出版《紅星照耀中國》而一舉聞名於世，那之前他又給人們以怎樣的印象？或許，連黨史專家也並不清楚毛澤東成為黨的頭面人物之前的情況，比如曾有過這張滑稽的照片流傳等。而經過一番調查後，我確信這種推斷無誤，所需要的是支撐研究的具體史料。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是多方收集早期毛澤

東的資料並逐步揭示謎底這一過程的記錄，而並無意強調貫穿全書的理論或主張等。換言之，支撐本書研究的全部動力不過是追尋謎底的強烈願望。當然，若說為何要追尋謎底，或可作如下解釋。即，由於已經知道歷史經過及其結果，我們有時反而無法理解當時人們擁有的日常性感受和常識；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們對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也一度惶恐不安，而對將要發生什麼卻又無法預知。有時，他們像是生活在按我們的常識無法想像的全然不同的世界。越是知曉後來的歷史，就越是為既成概念、觀念所束縛而難以準確理解和把握當時的情況，此即學習和研究歷史的悖論。換言之，對於毛澤東，或許中國學者正因十分熟悉而易為先入之見所累；而相對生疏的我們，哪怕掌握資料不見得充分，反倒能夠理解缺乏可靠信息的時候是什麼狀況。就毛澤東形象而言，相關信息在國外也為數不多，而且錯誤信息相互糾纏、衝突形成各種衍射，因而在國外從事研究的學者處理那種虛實相混的局面或許更具優勢。

把不熟悉當作優勢去探究當時的人們也同樣不熟悉的時代——本書就是基於這種態度而寫成的。至其內容，但願不止於「作為外國人，寫得遠行」的水準；而採用偵探小說般的敘述方式，則是為使平時不太關心中共黨史的讀者也能對本書發生興趣。不過，結果是否如此，還請讀者評判。

本書曾得到許多幫助。首先需對協助收集資料的各位學者表示感謝。搜求俄文書刊尤其不易，潘佐夫先生(Alexander Pantsov，美國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教授)和索特尼科娃女士(I. N. Sotnikova，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在這方面提供了莫大幫助，尤須深致謝意。實際上，本人也曾撰寫毛澤東傳的潘佐夫先生，是本書介紹的原蘇聯中國問題專家愛倫堡(國外最早的毛傳作者)的外孫。潘佐夫教授將其外祖父寫於1934年的俄文毛傳贈與本書著者，並惠允公開。日本方面，波多野乾一(「胖子毛澤東」照片的

介紹者)的孫女、京劇研究家波多野真矢女士應本書作者請求調查史料,並惠贈乾一照片。本書執筆過程中,著者得知愛倫堡和波多野乾一這兩位先驅學者的孫輩竟也都在從事中國研究,曾大發因緣輪迴之嘆。再次對潘佐夫先生、真矢女士表示感謝。

為查閱斯諾採訪陝北的資料、他和韋爾斯所拍照片及其底片,著者曾自2013年至翌年前往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檔案館、猶他州楊百翰大學檔案館及加州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各館都積極開放藏件,允許拍照複製。此番經歷使著者認識到,運用眾多影像、照片等資料撰寫論著,離不開檔案館、圖書館的鼎力協助。在中國和美國搜尋資料時,也分別得到南開大學張思教授、京都產業大學瀧田豪教授的協助,深表感謝。此外,繁體字版出版前,曾有兩位匿名評審精心審閱書稿,並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本書部分記述缺陷得以修改全賴其功,特致謝意。

最後,繼前著《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之後,本書也由陳甜女士擔任責編;值此正式出版之際,著者願對陳女士的敬業態度和認真工作再次表示感謝。本書簡體字版編輯過程中,陳女士轉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而當時著者也正與該社協商繁體字版的出版事宜。陳女士於是同時負起了簡體字版和繁體字版的編輯之責。這種機緣巧合實屬少見,著者也因此深感與陳女士緣分匪淺。本書翻譯仍委託著者最信賴的袁廣泉先生(江蘇師範大學副教授)。袁先生的譯筆,忠實可信無需贅言,尤其可貴者在於能反映原文的細微之處。本書得上述各位傾力相助終得出版,欣慰之至。

石川禎浩

2019年11月